
鲁迅回忆录

正误

朱 正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回忆录正误

朱 正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长沙

Qaz48/04

鲁迅回忆录正误

朱 正 著

责任编辑：黄仁沛

装帧设计：张小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3,000 印数：1—10,000 印张：7.75

统一书号：10109·1212 定价：0.67元

目 次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1)
错怪了介孚公	(6)
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	(13)
鲁迅一九一六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	(23)
关于四篇随感录的著作权问题	(28)
鲁迅和盐谷	(30)
《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	(35)
附录：《呐喊》中各篇的写作日期	(49)
关于未名社的被封	(56)
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一次会见	(62)
鲁迅一九三二年的北京之行是为了什么？	(70)
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	(91)
关于“北平五讲”	(107)
《文学杂志》是北平左联办的吗？	(120)
《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	(131)
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	(143)
芸生是谁？	(161)
也战斗，也休息	(170)
怎样解释鲁迅给黄源的四封信？	(177)

关于一九三六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187)
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192)
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	(195)
用火腿夹带过书信吗？·····	(204)
鲁迅懂得法文吗？·····	(207)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211)
 编完写起·····	 (225)
 后 记·····	 (240)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一文中说：

“他自己承认，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他限定功课，譬如叫他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的唯一的教授法是背诵），他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他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书责令他背诵，他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他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欣慰的纪念》第一百三十五页）

鲁迅从小就博闻强记，聪颖过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许广平说的前面那一大段，很可能确实有那么一回事吧。至于她说的那个后来被“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的先生，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通常，做教师的总希望学生聪明，例如，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鲁迅在写给当时只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不是称赞她说“幸骏才之易教”吗？（见《鲁迅书信集》编号100）而这一位竟被学生的聪明易

教吓退了的与众不同的教师究竟是谁呢？

鲁迅幼年，从来没有过延老师到家里来课读的事情。（其实，这也就已经排除了教师辞职或者不辞职的前提。）他从师就学的经过，在许寿裳作《鲁迅先生年谱》中曾有简单的记载：

“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六岁。是年入塾，从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十二岁。正月，住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百一十六页）

玉田即周兆蓝。鲁迅在《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对他曾有一段怀有敬意的描写：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很爱和孩子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

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也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形：

“鲁迅手抄本中有一册《鉴湖竹枝词》，共一百首，是玉田所著，乃是从手稿中抄出来的，卷末

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可知他给鲁迅的影响不浅，关系始终不坏。”

从上面所引材料中，可知他显然不是那个终于不得不辞职的先生。

再看三味书室的寿先生。鲁迅在《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更说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终生都对他怀着敬意，就是到后来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仍旧和他有书信往来。那时寿先生的儿子寿洙邻也在北京工作，他和鲁迅之间的往来也颇为密切。例如鲁迅到平政院控告章士钊非法免职一事，他就曾经为鲁迅出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后，他曾经写信给鲁迅指出了其中的一处差错。《鲁迅日记》中凡是提到寿镜吾的地方，都是尊称为“寿师”或“镜吾先生”。可见他显然也不是那个终于被迫辞职的先生。

鲁迅幼年曾经跟他念书而在许寿裳编《年谱》中没有记载的，还有花塍与子京。周启明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么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这之后还跟子京读过，也是叔祖辈的

一人，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知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糗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猴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第十三至第十四页）

鲁迅幼年的四位老师之中，只有这个子京与许广平说的有某些相似，不过也并不完全相符。第一，从许广平的文章来看，她说的这位先生应该是被延到学生家里去教书的塾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生辞职的问题。子京显然不是这个情况，仅仅是因为他住得近，小孩子去他家方便，才顺便去请他教读的。第二，从他文理不通的程度看，大约子京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教师，他

还没有分辨称职和不称职的能力，因而也就决不会知难而退主动辞职的。事实上，鲁迅兄弟不再到他那边去上学，也并不是因为他主动辞职，而是伯宜公看他太糊涂，只能误人子弟，才决定不再叫他们去的。总而言之，在鲁迅幼年的学习生活中，实在找不出一个被学生的聪明弄得只好辞职了的先生。

错怪了介孚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祖父在很早的时候，就让他抄写许应骢驳康梁变法的奏折。康梁变法在我们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毫不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新’运动，但许应骢即使对这个‘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都要反对，可见其思想之保守与反动之甚了。而鲁迅的祖父又拿这个奏折来让他抄写，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这不是要从小制服这个在他们眼里桀骜不驯的人吗？”（第四页）

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确是有人拿了《申报》上刊登的许应骢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叫鲁迅抄下来看。关于这事，鲁迅在自己的回忆文《朝花夕拾·琐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

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骘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这里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让他抄这份奏折的，是“一位本家的老辈”。“本家的老辈”是指旁系尊亲属，祖父是直系尊亲属，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本家的老辈”可以用来称呼比方玉田、花塍、子京、椒生……或者别的谁谁谁都行，唯独不能用来称呼自己的祖父介孚公。用字一贯严谨准确的鲁迅，决不会把自己的祖父称为“一位本家的老辈”的。既然他自己写的是“一位本家的老辈”，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人必定不是他的祖父介孚公了。

其实也不必这样咬文嚼字。就事论事，即使介孚公当真“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当时他也没有可能来做这一件事。道理很简单，介孚公因科场案于一八九三年关进杭州府狱中，直到一九〇一年才出狱。《申报》发表许应骘的这一篇奏折，是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事，这时介孚公正关在狱中，没有行动的自由，怎么可能拿这份奏折让鲁迅去抄呢？

介孚公在狱中的时候，是有亲属随侍的。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正好碰上鲁迅随侍的时候，介孚公让他抄写了这份奏折呢？

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周作人的《知堂乙酉文编》中有一篇《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颇为详细地记载了介孚公的狱中生活。开始家里前去随侍的，是介孚公的姨太太

以及姨太太所生的幼子伯升。后来伯升到南京进了水师学堂，就由周作人接着前去随侍，鲁迅一直没有长住杭州随侍过。但是，鲁迅是曾经前去探监的，这有不可能是在他探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不可能。因为鲁迅到杭州府狱去探监的日期，据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附录《旧日记里的鲁迅》一文中的记载，一八九八年有二月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五月二日这四天。时间都在五月二十四日《申报》发表这一奏折之前。一九〇〇年一月鲁迅从南京学堂回家过春节，路过杭州，也曾经去探望祖父，这又在那奏折发表以后很久，时间都不合，所以叫他抄奏折的事也不可能发生在他去探监的时候。何况《琐记》一文说得很清楚，这是在南京学堂里的事。一在杭州，一在南京，地点也不符。由此可以知道这事断然和介乎公无关。

不是祖父，那么这人又是谁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在南京的“本家的老辈”中寻找。考当时鲁迅在南京的本家的老辈，共有三人。一个是同在水师学堂学习的庶出的叔父伯升，辈份虽长而年龄反到比鲁迅小一岁，这人自己喜欢看一点戏，而不喜欢去管别人的这些闲事。一个是诚房的鸣山，也在水师学堂学习，比鲁迅才大五岁，虽是叔侄，却也是小朋友。另一个就是当时在江南水师学堂担任监督的从叔祖周庆蕃（椒生）了。鲁迅本人以及他们家族另外几个人到南京进水师学堂都是因为他的关系。我们只要看看他的思想作风，就可以断定当时让鲁迅抄奏折的必定是他无疑了。

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中，是这样介绍椒生的情况

的。

“他……根本上是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信奉三纲主义，附带的相信道士教，……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也要在净室去朗诵《感应篇》若干遍，……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

周庆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事不是他还能是谁干的呢！

《华盖集·忽然想到(五)》中说：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

显然，这里说的“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指的必定也就是这个周庆蕃，这就不用多说了。

上面，我们已经从时间和地点的不合证明了这事不可能是介孚公做的，如果我们仅仅说了这一方面，那么，对

于介孚公依然是不公平的。我们说，错怪了介孚公，不仅是指他没有干这件事，而且现有的材料还可以证明：他不会干这种事。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回忆说：

“祖父是封建家庭的家长，但是和别的同时代的家长相比，他比较民主些。那时一般的读书方法是叫小孩子念四书五经，依次念下去。他却主张小孩子先念一点历史，以便使他们对历史有一个简单的概念。然后他主张叫小孩子读《西游记》，他说《西游记》容易懂，小孩是喜欢看的，所以可先看。读了《西游记》以后，就可以念《诗经》，《诗经》也比较易懂。以后再读别的。如果要念诗，他认为最好先念白居易的诗，然后再念李白、杜甫的诗。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进步的。”（周建人：《鲁迅幼年的学习和生活》，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心中的鲁迅》，第二页）

在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读经书，习八股，才是正途，最忌辞赋杂学，《西游记》之类的小说就更不用提了。介孚公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至少，比《红楼梦》里描写的贾政的教育思想，就要开明得多。

周建人的这一段回忆是很准确的，可以指出的只有一处微不足道的误记，那就是介孚公并不主张小孩子学杜诗。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还保存了一张介孚公写给樟寿（即

鲁迅) 诸孙的字条, 写下了他对于学诗的意见: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 取其明白易晓, 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 志高词壮, 且多越事。再诵苏诗, 笔力雄健, 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 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 韩之奇崛, 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介孚公不只是教育思想比较开明, 就是对于戊戌前后流行起来的维新思潮, 也是能够接受, 甚至多少有些赞同的。前面说过, 一九〇〇年一月, 鲁迅从南京回家过春节, 路经杭州, 曾经顺便去探望祖父。据周遐寿在《旧日日记里的鲁迅》一文中说, 当时鲁迅带回家的东西中, 就有浙江求是书院章程一本, 《圣武记》一部十本。“这末后两种盖系过杭州时祖父交付带回者, 那时求是书院刚成立, 祖父信中曾谈及, 明正二十日招考儒童六十人, 可以去考云。”这里的求是书院是当时维新浪潮中办起来的一个新式学堂, 这《圣武记》是清代地主阶级进步人士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的一部著作, 记述了从清朝建立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史料, 由于它所述史实相当可靠, 至今还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从介孚公交给鲁迅带回的这一份章程和这一部书表明, 他的思想一点也不顽固保守, 对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运动持有某种程度的赞赏态度。他又怎么会把许应骙攻击康梁变法的奏折定为自己孙子的“学习文件”呢? 这一点, 不仅涉及怎样实事

求是地评价介孚公的问题，而且对于弄清楚鲁迅幼年从家庭所受的影响这一问题也是重要的。正如大家都看见的，至少介孚公的那种不畏权贵的态度，在鲁迅身上就有着明显的影响。